

明清時期香山—澳門留學現象芻議

沈榮國*

明清時期，基於特殊的歷史機緣，香山地區（含今珠澳地區）形成了近代西方文化滲入封建中國的“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催動了古代留學教育向近代留學教育的轉型。其中，鄭瑪諾等以宗教留學教育的形式打開了古代留學教育的缺口，容閔等則開近代中國留學的先河，啟動晚清官派留學教育的歷程。香山與澳門兩地的歷史合作，共同鑄成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獨一無二的源頭。當時的留學文化現象，強化了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匯，徹底打開了古老中國融入近代世界的門徑。



留美幼童出國前合影

* 沈榮國，山東臨清人，文史學者，主要從事近代中國留學史、珠澳地方史、民國職業教育史、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及人物研究，已有著作及學術文章近百萬字，現為珠海容閔與留美幼童研究會研究室主任。

自1926年舒新城先生編著《近代中國留學史》以後，中國留學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香山和澳門是其中的重要研究區域之一。近十餘年來，珠海曾舉辦過多次留學文化研討會，出版有兩輯十三冊《珠海容閔與留美幼童研究叢書》，今年又編輯出版了《珠海留學史(1840-1949)》⁽¹⁾，來自今珠海南屏的容閔幾乎成為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符號。澳門的鄭瑪諾等近代之前的宗教留學生也是一些學者關注的重點。⁽²⁾ 他們認為鄭瑪諾等人向所到國家適時介紹有關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習俗，譜寫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³⁾，甚至有學者認為他們開創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的先河⁽⁴⁾。不過，很少有人將澳門的鄭瑪諾等與香山的容閔等留學人士當做一個整體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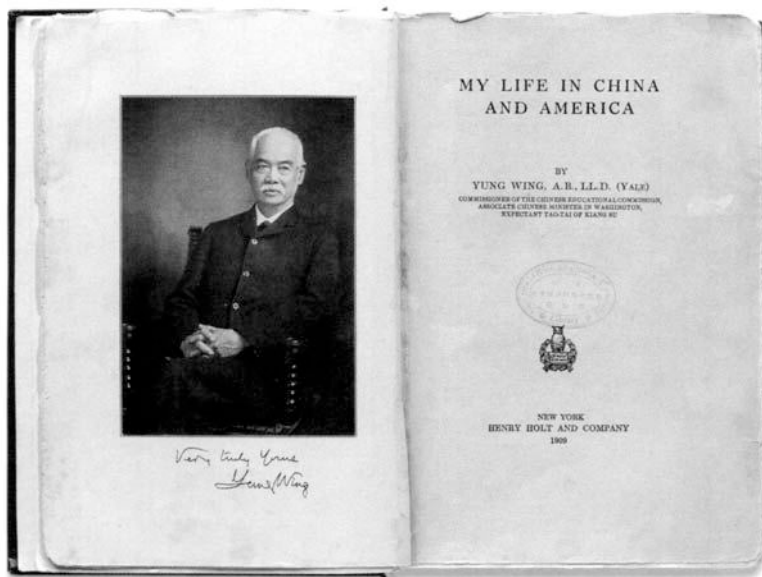
近年，珠澳同城化的趨勢越來越受人關注，兩屆“珠澳文化論壇”陸續召開。海內外學者一致認為“珠澳兩地，本是同城，有着不可分割的歷史和文化淵源”⁽⁵⁾，把兩地看做“近代中西文化走廊”，具有充份的歷史根據。⁽⁶⁾ 其實，兩地在明清時期的留學現象是彼此緊密相連，先後相續的整體。據此，筆者不揣淺陋，對此稍作探討，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留學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早在西元前4-5世紀，地中海之濱興起古希臘文明之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先哲的魅力吸引了許多古羅馬和小亞細亞青年紛紛赴雅典各學院學習，造就了歐洲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的留學萌芽。爾後，世界各國的留學生交流主要集中在於中世紀的各大文明區域。⁽⁷⁾ 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長期走在世界前面，是周邊地區學習、倣效的榜樣。據載，早在600-614年的十四年間，日本聖德太子先後五次派“遣隋使”來到中國，且於608年開創派留學生來中國學習的先例。⁽⁸⁾ 之後到明朝中期，大量周邊國家的學子來到中華大地，接受中國儒學教育，學習中華文明，推動周邊地區走出野蠻狀態。⁽⁹⁾

明朝中期以後，中國延續封建王朝更替的同時，世界文明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歐發生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業革命，實現了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並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中國相對於周



耶魯大學畢業時的容閔



容閔晚年寫的自傳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譯《西學東漸記》)

1844.

Report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623

CATALOGUE OF THE PUPILS THAT HAVE BEEN, AND NOW ARE IN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

Names.	Age at ent.	Residences.	When entered.	When dismissed.	Remarks.
Aling,	16	Macao,	Nov. 4th, 1839.	Oct. 12th, 1840.	Dismiss. for bad conduct.
Ashing,	15	Macao,	Jan. 1st, 1841.		
Akan,	14	Ngauhung lai,	March 1st, 1840.		
Ats'euk,	14	Shanchéung,	Nov. 4th, 1839.	Aug. 19th 1840.	Driven from the school by his father. Returned again June 1st, 1842.
Awan,	13	Macao,	March 1st, 1840.		
Awing,	13	Námping,	Nov. 1st, 1840.		
Ahóp,	12	Tsin shán,	Nov. 11th, 1839.	Feb. 10th 1840.	Dismissed for idleness.
Ayón,	11	Shanchéung,	Nov. 4th, 1839.	Aug. 19th 1840.	Dismissed for idleness.
Awai,	11	Shanchéung,	do. do.	do. do.	do. do.
Achik,	11	T'óngkák,	do. do.		
Afón,	11	Tungngón,	Mar. 13th, 1840.		
Tinyau,	11	Námping,	Mar. 28th, 1840.	June 28th 1840.	Dismissed for bad conduct.
Alun,	10	Macao,	Mar. 16th, 1840.	June 30th 1840.	Dismissed for repeatedly going home without liberty.
Akú,	10	T'óngkák,	Nov. 1st, 1841.	Jan. 1st, 1842.	
Ats'au,	12	T'óngkák,	do. do.		
Ayuk,	11	T'óngkák,	do. do.		
Ayón,	14	Shántau ún,	do. do.		
Alik,	11	Kúnt'óng,	do. do.	Jan. 1st, 1842.	
Amí,	12	Námping,	do. do.	do. do.	Dismissed as unpromising scholar.
Akwai,	11	Ngái hau,	do. do.	do. do.	
Atsám,	11	Shántau ún,	do. do.	do. do.	
Apó,	11	Pátz' shek,	do. do.	Nov. 14th 1841.	Dismissed for idleness.
Atsó,	12	Shéungtsák,	do. do.	Nov. 6th, 1841.	
Ahung,	11	Shéungtsák,	do. do.	Nov. 7th, 1841.	Dismissed for idleness.
Afónlam,	11	Hauháng,	do. do.	Nov. 1st, 1842.	Dismissed for idleness.
Alam,	11	Hámi,	do. do.	do. do.	
Afai,	13	Kúhok,	do. do.	do. do.	
Ach'ing,	12	Kúhok,	do. do.	do. do.	
Alammuk,	10	Pátz' shek,	do. do.	do. do.	Removed by their parents when the school was taken to Hongkong.
Ashing,	15	Ningpo,	April 7th, 1843.		
Ahing,	15	Samchau,	do. do.		
Afai,	14	Whampoa,	do. do.		
Ashin,	13	Whampoa,	do. do.		
Sh'nsz',	10	Nanking,	do. do.		
Aiú,	12	T'óngkák,	do. do.		
Alín,	11	Santsún,	do. do.		
Akwong,	10	Whampoa,	do. do.		
Láiss',	9	Nanking,	do. do.		
Kwongchú,	9	Tinghai,	May 15th, 1843.		
Ayamyau,	9	Macao,	April 7th, 1843.		
Afó,	8	T'óngkák,	do. do.		
T'insau,	18	Singapore,	Sept. 1st, 1843.		

to huddle a dozen or two boys into one apartment is a most suitable provision for the furtherance of those evil communications that corrupt good manners and morals. The vices of the worst may and do thus easily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e rest, and it is not unfrequently a wonder that the virtues of any survive their school-days. No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with regard to neatness and order is in such cases felt among them. Without something like the arrangement

to huddle a dozen or two boys into one apartment is a most suitable provision for the furtherance of those evil communications that corrupt good manners and morals. The vices of the worst may and do thus easily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e rest, and it is not unfrequently a wonder that the virtues of any survive their school-days. No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with regard to neatness and order is in such cases felt among them. Without something like the arrangement

容閱等入學馬禮遜學校時間表（馬禮遜學校年報1844年刊）

邊國家的文明優勢逐漸消退，被迫去迎接世界範圍內的全新文明的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偏南一隅的今珠澳地區走進歷史的中心舞臺。當時，該地區屬於廣州府香山縣，而“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最貧”⁽¹⁰⁾。清朝初期，香山的西北部和東北部

相繼成陸。⁽¹¹⁾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擴張的過程中，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意大利等早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裡開始侵擾中華大地。明嘉靖十四年（1535）左右，廣東官府開放澳門為中外貿易的地點之一。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船長索薩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通過談判獲得在澳門的居住權。⁽¹²⁾爾後，中國通過在今珠海地區設置“駐澳官”、參將府、香山縣丞、澳門海防同知等機構，“專司稽查民番一切詞訟”⁽¹³⁾，管制澳門；而澳門葡萄牙人通過選舉，建立議事會，設置理事官“掌本澳蕃舶稅課、兵餉、財貨出入之數，修理城臺街道”⁽¹⁴⁾，實現部分自治。這樣，香山－澳門地區形成了管、治結合的整體。這種中西管、治結合的態勢，既打開了西風東漸的大門，又避免了葡萄牙這個迅速沒落的西方小國的獨佔，而向所有西方人開放，“實際上成為歐洲人在中國的前哨站”⁽¹⁵⁾，西方的宗教、語言、教育等也隨之在這裡展現在天朝子民面前，與當地中國文化初步碰撞，由此形成了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態勢，開啟了中華帝國應對西方新式機器文明挑戰的歷程。

明朝後期和清代，中國政府在長期採取抑制海外貿易的閉關鎖國政策的同時，始終保留廣州和澳門

作為對外通道。嘉靖元年（1522），明朝廷罷閩、浙二市舶司，封閉泉州、寧波二港，僅存廣州一處通商口岸。而清朝初期，三次下達“遷海令”，將“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人民，盡遷入內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入水，粒貨不許越疆”⁽¹⁶⁾，嚴禁沿海居民出海經商貿易，但對澳門“准予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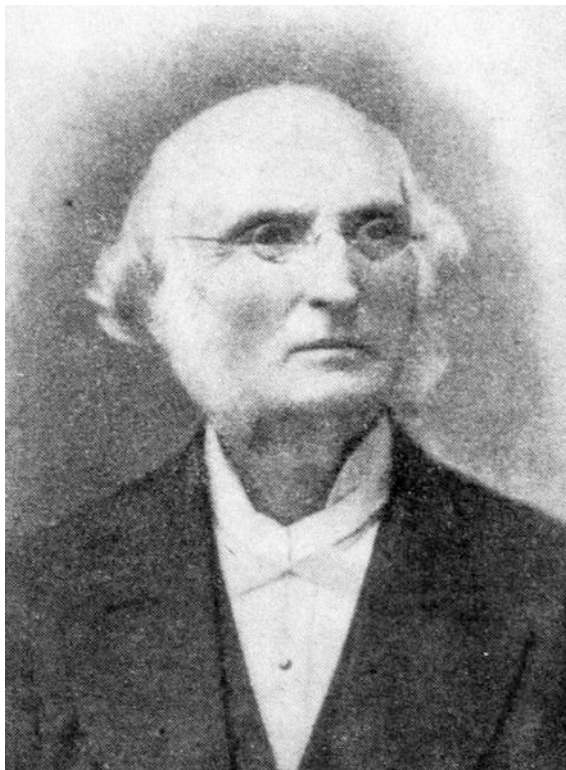
遷”，並專門開放澳門與廣州之間的陸路運輸。爾後，在澳門設立“澳門總口”，所有往來船隻一律祇准停靠在澳門。1757年，清朝再次下令關閉江、閩、浙等關，祇留廣州一個對外貿易口岸。在這種情況下，靠近廣州、位於華南沿海出口處交通便利的香山地區，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唯一樞紐。沿着這未曾關閉的管道，大量附帶西方機器文明的新式事物由香山地區源源不斷地進入中華各地，形成了獨特的“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推動了中西文明的進一步接觸。

文明勢位的變換和新舊文明間的碰撞必然催生留學教育的新陳代謝，承接早期中西文化的“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催動了古代留學教育向近代留學教育的轉型，開啟了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先河，推動了晚清留學教育的全面發展，率先湧現了舉世矚目的留學家族群落，全方位地為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宏基。

二

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國家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中，面對尚且強大的中華帝國，暫時缺乏武力征服的能力，他們轉而利用宗教手段將侵略的爪牙滲透入中華大地。早在1540年，當時的葡萄牙國王和羅馬教皇派遣聖方濟各·沙勿略來到東亞傳教，曾多次設法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均未成功。⁽¹⁷⁾葡萄牙人“租借”澳門後，成立了澳門教區，轄區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和所有毗連的島嶼。⁽¹⁸⁾藉此，泰西傳教士接踵而來，絡繹不絕，其中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進入明清宮廷，以科學的力量獲得皇帝信任，打開了傳教的局面，同時也刺激了中國人的開放意識和走向世界的願望。在他們的誘導和運作下，少數中國教徒開始赴歐深造神學，鄭瑪諾是其中第一個。

鄭瑪諾，中文名惟信，祖籍廣東香山縣，1633年生於澳門，早年皈依天主教並進入澳門神學院



帶領容閔等人留學海外的布朗牧師

讀書。1645年12月20日，鄭瑪諾隨陸德神父啟程赴歐；1651年，到達羅馬，進入聖安德勒初學院學習。當時的鄭瑪諾極其清貧，據該院記載：“鄭瑪諾，澳門人，18歲，10月17日到達聖德院，隨身攜帶帽1、長袍1、短大衣1、紅布長褲1、粗毛襪1雙、手巾1、皮鞋1雙。上述各件，大部分已陳舊。”⁽¹⁹⁾爾後這個清貧的中國人以難能可貴的刻苦努力，用不到兩年的時間完成了歐洲學生四年的學習課程，達到了“文學生”的程度。1653年，鄭瑪諾轉入羅馬公學深造，攻讀修辭學、邏輯學、物理化學、音樂和外語等多門課程。1657年，他修完這些課程後，又留校擔任了三年實習教師，講授拉丁－希臘文法和拉丁－希臘文學。1600年，他重返校園，續修神學。1661年10月，神學課程修讀完畢，他離開羅馬前往里斯本，候船回國。鑒於當時的航海技術及其它歷史因素，他這一等就是四年。在這四年裡，鄭瑪諾進入科英布拉大學，修讀《名理探》、《寰有



和容閔一道留學海外的黃勝



和容閔一道留學海外的黃寬

詮》等神學課程。他於1666年4月13日乘商船回國，1668年到達後在廣州附近傳教兩年；1671年，奉康熙上諭進京，前往朝廷供職；1673年，病逝於北京。⁽²⁰⁾

十年後，即1681年，一黃姓青年和一沈姓青年隨洋教士阿都斯·里昂到達葡萄牙和法國，其中沈姓青年於1693年回到中國，黃姓青年留在法國皇家圖書館工作，編撰有《漢法大辭典》，於1716年逝世於巴黎。⁽²¹⁾ 1724年，專門培養中國神學留學生的學校——中華書院成立，最初祇有馬國賢帶去的五名中國學生，後來確定收定例中國學生二十二名。自建立至1861年結束，先後有一百零六名中國學生在此接受神學教育。⁽²²⁾

鄭瑪諾等人開啟的宗教留學教育，出現在新的資本主義文明逐漸抬頭的時代，是中國與更廣泛的世界新文明接觸的產物。在這種教育形態裡，不再是國外人士來到中原沐浴儒學文化，而是天朝子弟負笈海外學習帶着宗教外衣的西方

文化，在宗教和淺顯的科技領域實現了中西文化的對接和融合，拓寬了“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的影響範圍，與隋唐以來的古代留學教育有着質的差別，成為古代留學教育向近代留學教育轉折過程中的座標和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曙光。

三

19世紀以後，工業革命席捲西歐和北美大陸，資本主義最終確立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勢。

“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承載的中西文化交流隨着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失卻了往昔對等的平和而日趨緊張，轉化為中國在屈辱中單向學習西方的態勢，近代意義上的留學教育也由此徹底破除古代文明格局造就的堅冰，最終以今珠澳地區為突破口走上歷史舞臺。

1836年9月，基督新教人士在廣州美國商館成立了“馬禮遜教育協會”，打算“以學校或其

他方式促進或改善在中國之教育”⁽²³⁾；爾後着手籌備馬禮遜學堂。起初沒有獨立設校，一直附屬於倫敦會傳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門創辦的女塾，今珠海南屏人容閔於1835年入讀該校。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夕，郭夫人關閉了所辦女校及附屬馬禮遜預備學校，容閔一時輟學回家。值得注意的是，容閔曾在其自傳《西學東漸記》中回憶說：“其後此塾因故停辦，予等遂星散。古夫人攜盲女三人赴美。”⁽²⁴⁾可以看出在近代之初，在今珠澳一帶已經有個別女性出洋留學了，比金雅妹1869年留學美國早三十年。⁽²⁵⁾

1839年11月4日，獨立的馬禮遜學校在澳門半島沙梨頭附近成立，由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布朗牧師主持並任教師。該校按西方學校的模式管理，對學生進行文化科學的全面培養，並提倡學生進行強健體魄的鍛煉。⁽²⁶⁾容閔、黃寬、黃勝、唐廷樞、唐廷植、唐廷庚等今珠澳地區的學子陸續進入該校讀書。在這裡，他們不僅學會了讀、寫、聽、說英語，還接觸到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物理，甚至聲樂等新式知識。在接受新式教育的過程中，部分學生開始萌發走出中國看世界的朦朧願望，曾有人專門作文〈一次幻想之旅〉，嚮往出國深造。

1847年，馬禮遜學校校長布朗牧師因夫人身體欠佳，打算回國，臨行前表示願帶三五名學生赴美留學。經布朗聯繫，香港《德臣日報》主筆蓄德魯特等教會人士願意提供兩年的留學經費。對此，容閔後來回憶說：

1846年冬，布朗先生回國。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略謂己與家屬均身體羸弱，擬暫時離華，庶幾遷地為良。並謂對於本校，感情甚深，此次歸國，亟願攜三五舊徒，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教育，諸生中如有願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學生耿聽其言，爽然如有所失，莫不發聲。其後數日間，聚談及此，每為之愀然不樂。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願與赴美之數人耳，即黃勝、黃寬與予是也。



徐文定公（徐光啟）與利子瑪竇談道圖

當勃朗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²⁷⁾

爾後不久，他們隨布朗牧師踏上前往美國的航船，進入孟松學校學習。當時的美國還沒有正規的高等中學，孟松學校是當時最好的預備學校，整個新英格蘭地區的優秀學生大都集中於這所學校。當年的校長是畢業於耶魯大學的海門先生，“其為人富自立性，生平主張儉德，提倡戒酒”，“夙好古文藝，尤嗜英國文。故胸懷超逸，其餘寬宏”⁽²⁸⁾。海門校長對中國“素抱好感”，不僅打破先例，招收他們三個中國學生，而且對他們禮遇有加，關懷備至。在海門校長的幫助和影響下，他們三人學習了數學、文法、生

理、心理和哲學等現代新式課程，而非近代以前宗教留學生的宗教課程。在學習之餘，他們三人還時常利用節假日外出打工，以補生活之用。至於室內的“灑掃拂拭及冬令熾炭於爐，劈柴生火諸瑣事”，更是一概自己動手，“藉以運動筋脈，流通血液”⁽²⁹⁾，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

1848年，黃勝因病提前回國。1849年，容閔、黃寬兩人按計劃讀完二年畢業。黃寬接受蓄德魯特等人的慷慨資助，畢業後前往蘇格蘭，隨即考入愛丁堡大學學習。1857年，黃寬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得“Medicine Doctor”，

成為在近代大學接受系統醫學訓練的第一個東方人。黃寬赴歐之際，容閔留在美國，於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獲得文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系統接受西方教育且獲得正式學位的東方人。

容閔和黃寬、黃勝三人雖然出國前受教於教會學校，其留學海外也得益於西方教會人士的資助，但他們與鄭瑪諾等人不同。他們留學前在馬禮遜學校所受的教育已經不是純粹宗教教義學習，他們留學國外不是宗教機構專門派遣的，他們在國外的學習也不再是宗教學習，而是由預備學校進入高等學府的普通國民教育。當年鄭瑪諾

回國其實是被耶穌會派來東方傳教，行前甚至受到葡萄牙國王的召見和訓示。而容閔等人留學期間及歸國後選擇的基點不再是宗教組織的意志，而是根據如何更好地服務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的需要來定。1850年，容閔在孟松學校畢業，面臨着一個兩難的選擇，“如去蘇格蘭，或獻身教會，均不虞教育費用”⁽³⁰⁾，然而容閔認為：“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傳道固佳，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³¹⁾為了能保持行動上的自由，以便創造條件為祖國謀福利，他先後謝絕美國教會、香港《德臣西報》主筆蓄德魯特和孟松學校的好意，選擇了自己創造條件以繼續求學的道路。黃寬歸國後，面對倫敦傳道會本傑明·霍布森醫生等英籍傳教士的歧視和排擠，很快辭去傳教士職務，在組織上與基督教會脫離關係，轉而全心致力於行醫救國救民、傳播西醫於中國的事業。

可以說，他們依託“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已經走出



馬禮遜學校



容閔、黃寬及黃勝入讀的孟松學校



唐國安等人與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合影

了明清時期宗教留學教育的範疇，開創了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先河。

緒，在晚清留學教育史上佔據了重要歷史地位。具體而言，如章開沅先生所言：

四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以後，葡萄牙趁火打劫，在澳門推行殖民擴張，公開宣佈澳門為其海外省和自由港，而負責澳門事務的中國官員“文官以閉曹自居，武員以陸路塞門自限”⁽³²⁾。1846年，啞馬嘮總督到任後，將設置於澳門的中國官員逐出澳門，香山與澳門之間長期存在的管轄關係由此終結，香澳一體的歷史被人為隔斷。此後，兩地留學教育出現分野。

香山方面，秉承“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形成的開放傳統，借助東南沿海的地理位置及香港興起的影響，延續了上個階段留學的餘

綜其大概主要有六端：1847年，容闓、黃寬、黃勝三人隨布朗牧師赴美留學，開近代中國留學教育之先河，此其一；1850年，黃寬由美國孟松轉赴英國愛丁堡留學，揭開近代中國留歐教育序幕，此其二；1872年，容闓首倡並親率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學，打開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局面，此其三；19世紀末，唐寶鐸、蘇曼殊等率先留學日本，在公費和自費兩方面啟動中國留日教育的歷程，此其四；19世紀下半葉，陸續有近二十名珠海子弟自費留美，佔當時中國自費留美生總數的近一半，此其五；20世紀初，唐國安、唐孟倫等主持派遣晚清三批庚款留美生，為民國留學教育的成熟性發展埋下伏筆，此其六。⁽³³⁾

由其中的第三至第六條可見，珠海留學教育不僅延續“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留學教育開風氣之先的傳統，陸續開啟中國官費留學教育、留日教育、庚款留學教育先河，還成為晚清自費留學教育的重要生力軍。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香山率先湧現出的留學家族群落，南屏容氏、北嶺徐氏、唐家唐氏等家族陸續形成了家族留學傳統，來自南屏、唐家、梅溪、南溪、翠微、北嶺等六個村落的七個家族中有名可查的留學人竟達近百人之多。⁽³⁴⁾ 這為香山留學教育活動在民國以後保持一定的規模奠定了基礎，也為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發展和成熟開創了一條可持續性發展的路徑。

澳門方面，因為當時中國對該地主權的喪失，留學其他國家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脫離了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範圍，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地域留學教育。

五

就傳統中國的版圖看，嶺南是不折不扣的邊緣，而香山與澳門則是這個邊緣中的邊緣，甚至往往被視為可以忽視的部分。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區域，在特殊的歷史境遇裡鑄就了“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湧現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留學現象，在近代中國留學教育史、世界文化交流史及全球化進程中都佔據着相當重要的歷史地位。

在明清兩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蒸蒸日上之際，香山－澳門地區基於特殊的歷史機緣成為近代之前數百年內聯繫兩種文明的唯一樞紐，中國古代留學教育在鄭馬諾等人身上以宗教留學的面目發生近代化嬗變，並最終在容閔、黃寬、黃勝三人身上開啟近代中國留學教育之端。近代之初，晚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之後，澳門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香山地區延續數百年的遺曲，在多方面推動晚清留學教育的全面發展，可謂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獨一無二的源頭。

當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為古老封閉的封建中國觀察、接觸新世界打開了一個視窗，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平臺。但是，西方文明和事物的東來並不等於中華子民的接納，中西事物的並存也不等於彼此的實質融匯，這時的中西文化融合無論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極其有限。當時中國社會的主導層——傳統士大夫對香山－澳門的西方事物依舊抱有濃重的倨傲姿態，不時吟出“野心迴響處，化日不私輝”（張汝霖）、“一角天開航海徑，果然無外是中華”（廖赤麟）、“思傳六籍將夷變，令識中華禮教尊”（劉世重）⁽³⁵⁾ 等帶有濃重虛驕心理的詩句。而下層民眾則常常以鄉土民俗為武器與之進行“文化上的對抗，文化上的較量”⁽³⁶⁾。

香山－澳門留學現象的出現，則改變了這種淺顯文化碰撞的局限。首先，在對待西方事物的態度方面，天朝子民留學國外預示着他們不再僅僅以觀察西洋景為娛樂，而是以主動姿態學習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方文化，是中國真正吸納西方文化的重要體現，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徑。其次，在影響階層方面，雖然這些留學人士大都出身貧寒，但他們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後成為當時罕見的精英人士，進而得以影響社會的上層，即留學帶動的是高層次的思想的輸入和新的思想觀念向社會上層的輻射⁽³⁷⁾，增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再次，在文化交流的地域方面，由於明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早期中外文化祇能在“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這狹小的地域裡碰撞，而留學現象的出現則將文化交流的範圍擴展為留學生所及的地域和國家，這樣極大地擴大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廣度。最後，在文化交流的方向方面，大量留學人不僅學習西方文化，還有意識地傳播中國文化於西方世界，甚至攜帶或贈送大量書籍於國外，打破了西方人士瞭解中國祇能通過西方傳教士的零散記憶的瓶頸，在西學東漸之餘推動了東學西漸。

這樣，明清時期香山－澳門留學現象的出現，實際上將“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中東西器物的簡單並存和兩種文化的淺層次碰撞，深

化到雙方實質性的深度融匯，徹底打開了古老中國融入近代世界的門徑。

【註】

- (1) 黃曉東主編：《珠海留學史(1840-1949)》，珠海出版社2010年版。
- (2) 黃鴻釗、陳樹榮、吳志良、徐明德、鄒振環、譚樹林、尹緒忠、許秀萍、肖朗、楊濤等學者都曾在其論著中涉及鄭瑪諾等宗教留學人，大都將其置於澳門史及近代前夕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
- (3) 參見譚樹林：〈清初在華歐洲傳教士與中國早期的海外留學〉，《歷史教學》2002年第6期。
- (4) 參見肖朗：〈清代初期至中期的留歐學生及其教育〉，《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 (5) 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序三。
- (6) 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序二。
- (7) 徐放鳴：〈論人類歷史上的留學運動〉，《江海學刊》2007年第1期。
- (8) 參見董明：〈中國古代來華留學生教育的啟示〉，《海外華文教育》2003年第1期。
- (9) 參見黃曉東主編：《珠海留學史(1840-1949)》，珠海出版社2010年版，頁10-12。
- (10) (乾隆)《香山縣誌》卷3〈風俗〉。
- (11) 參見張建軍：〈論珠海遺存的形成及其文化屬性〉，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頁5。
- (12) 參見費成康著：《澳門：葡萄牙人逐步佔領的歷史回顧》，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頁24。
- (13) 潘思渠：〈為敬陳撫輯澳夷之宜以昭柔遠以重海疆事疏〉，轉引自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
- (14)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頁151-153。
- (15) 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p. 60.
- (16) 〈遷界徙沿海居民於內地〉，夏琳撰：《閩海紀要(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頁39。
- (17) 參見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版，頁1087。
- (18)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一冊)，澳門基金會1995年版，頁18。
- (19) 參見方豪撰：《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二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頁191。
- (20) 參見方豪撰：《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頁31。
- (21) 參見孫石月著：《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頁5-6。
- (22) 參見黃鴻釗著：《濠鏡新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10年版，頁220-222；孫石月著：《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頁7-8。
- (2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 373-375.
- (24) 容闕：〈西學東漸記〉，鍾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44。
- (25) 參見孫石月著：《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頁43。
- (26) 參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2005年版，頁242。
- (27) 容闕：〈西學東漸記〉，鍾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49。
- (28) 容闕：〈西學東漸記〉，鍾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54。
- (29) 容闕：〈西學東漸記〉，鍾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55-56。
- (30) (美)勒法吉原著、高宗魯譯註：《中國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15。
- (31) 容闕：〈西學東漸記〉，鍾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58。
- (32) 厲式金修、汪文炳等撰：《香山縣誌續編》卷六，〈海防〉。
- (33) 黃曉東主編：《珠海留學史(1840-1949)》，珠海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1頁。
- (34) 黃曉東主編：《珠海留學史(1840-1949)》，珠海出版社2010年版，頁196。
- (35)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頁139、233、52。
- (36) 轉自(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版，頁532。
- (37) 趙立彬：〈澳門與全球化視野下近代中國思想觀念的變革〉，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頁149。